

□ 吴泰昌 著



軼文 軼話

轻灵的手笔 翔实的内容
葆有史料价值和轶事笔记的趣味



◆ 吴泰昌著

軼苑
話文



艺文轶话
吴泰昌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960 1/32 印张：11.625千字：192

印数：1~6161册 定价：4.60元

ISBN7-5008-0774-0/I·187

序

孙犁

我和泰昌同志，认识的时间，不算太长；接触的也不是太多。在一些文字工作的交往中，我发现他是一位很干练的编辑，很合格的编辑。他在工作上，非常谦虚。当今之世，不合格的编辑并不少，有的人甚至不辨之无，而这些人，架子却很大，很不谦虚。

今年春天，泰昌同志对我进行了一次采访，就是登在本年六、七月份《文艺报》上的那次谈话。我是很不善谈的，特别不习惯于录音。泰昌同志带来一台录音机，放在我们对面坐的方桌上。我对他说：

“不要录音。你记录吧，要不然，你们两位记。”

当时在座的还有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同志。

泰昌同志不说话微笑着，把录音机往后拉了拉。等我一开讲，他就慢慢往前推一推。这样反复几次，我也就习惯了，他也终于完成了任务。当然，他能够完成任务，还因为在同我接触中，他表现出来的真诚和虚心的工作态度。

编辑必须有学问，有阅历，有见解，有独到之处。观我国文化史，有许多例子证明，编辑工作和学术之间，有一条互通之路。有许多作家学者，在撰述之暇，从事书刊编纂；也有因编辑工作之年积月累，终于成为学者或作家。凡是严肃从事一种工作的人，他的收获总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的。

泰昌同志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外，还不断写些文章，其中有不少部分，是带有学术性和研究性的文章。我是很喜欢读这类文章的。我觉得，我们很多年，太缺乏治学的空气了。

治学之道，当然不外学识与方法。然学与识实系两种功夫。不博学当然

无识力，而无识力，则常常能废博学之功。识力与博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认真求实的精神，是提高识力的重要因素。

现在，国内的学术空气，渐渐浓厚。但是脱离实际，空大之风，似尚未完全刹住。有些大块文章，人们看到，它摆开的架子那么大，里面有那么多经典，有那么多议论，便称之为学院派。贬抑之中，有尊畏之意。其实学院派的文章，总得有些新的研究成果，如果并没有什么新的成果，而止是引经据典，人云亦云，读者就不如去自翻经典。或作者虽系一人，而论点时常随形势变化，那么，缺乏自信的文章，于他人能有何益呢？所以说，这种文章，是连学院派也够不上的。

这就涉及到治学方法的问题。现在，各个学术领域，都标榜用的是唯物辩证的方法。但如果牵强附会，或只是一种皮毛，甚至皮毛之内，反其道而行之，其收效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不能用政治或立场观点来代

替。学术研究的是客观存在。学术是朴素的，过去叫做朴学。

用新的方法，不得其要领，只是赶时髦，求得通过，对于学术，实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学术，是要积蓄材料，记述史实，一砖一瓦，成为著作。是靠作者的真才实学，真知灼见，并不单纯是方法问题。过去我国的学术，用的都是旧方法，而其成果赫然自在。正像刀耕火种，我们的祖先也能生产食粮一样。

泰昌同志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畅，考订详明，耐人寻味。读者用很少时间，能得到很大收益。写文章，不尚高远，选择一些小题目。这种办法很可取。小题目认真去做，做到能以自信，并能取信于人，取信于后世，取信于科学，题目再小，也是有价值的。

当他的《艺文轶话》就要付印的时候，泰昌愿意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把平日的一点感想写出，与泰昌同志共勉。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目 录

序

孙 犁

周总理与第一次文代会	1
《西行漫画》的流传	5
《女神》的一个修改本	13
柳亚子的诗	18
钱杏邨与《二心集》	22
且说《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	28
蒋光慈的原名、改名及其它	31
郁达夫与太阳社	35
《郁达夫著作编目》补遗	41
齐燕铭遗札	43
一次突然的消失	48
忆“五四”，访叶老	52
活跃的沪版《救亡日报》	
文艺副刊	59
作家的可贵友谊	67
沈尹默和新诗	71

李自成在我国文艺上的反映	74
《沈尹默书曼殊上人诗稿》	77
再谈柳亚子的诗	80
孤岛文坛上的一现昙花	84
《倪焕之》与侯绍裘	86
蒋光慈与《失业以后》	89
从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左 联”谈起	92
漫话《抗战八年木刻选集》	97
关于瞿秋白文学遗著的刊印	101
《小说年鉴》	104
《秦牧杂文》	107
殷夫的成长说明了什么？	110
田汉的散文	114
《边鼓集》	117
张闻天早年的文学译著	120
业余佳作	124
《怀旧》的雪泥鸿爪	126
文学研究会宣言的起草者	129
叶灵凤与麦绥莱勒木刻连环故 事集	133
郁达夫的早期代表作《沉沦》	136
初版《鲁迅全集》话絮	139
巴金第一部长篇《灭亡》的	

问世	142
我国第一份“诗刊”	144
想起“亭子间”	147
“诗人的欢喜”	151
徐玉诺与散文诗	154
郁达夫的自序	157
“湖畔”诗人	160
包天笑与鸳鸯蝴蝶派	163
当年的《赛金花》	167
元戎兼诗人的黄兴	170
茅盾与“ABC”	173
孙中山的诗作与诗论	176
引进西方艺术的第一人——李	
叔同	179
曾朴侠诗《燕都小吟》	187
文艺作品中的秋瑾	193
跛少年的译作	196
熟读《猛回头》的一乡民	199
小仲马话剧《茶花女》	
的中译	201
漫话《野草》	204
陈天华、秋瑾、朱执信的三篇	
小说	208
不以诗人自居的诗人	

——马君武	213
周瘦鹃与花花草草	221
屠格涅夫的散文诗	225
《郁达夫诗词抄》晚出之谜	227
朱自清的欧游二记	231
孙犁的《书林秋草》	234
开卷有益	237
最早评论《子夜》的文字	240
蒋光慈谈新诗的一篇序文	243
冯宪章发表于《东山学生》 的诗	248
《抗战独幕剧选》及田汉 的序	252
阿英有关晚清文学的三本书	257
朱光潜与对话体	262
听朱光潜先生闲谈	267
老师的书	283
吴组缃的《山洪》	288
梦的记忆	293
阿英的日记	299
文汇情谊	305
难忘的微笑	308
温暖的记忆	314
扉页上的话语	317

《诗论》重版漫忆	320
不该忽略的文坛老人	328
乐在浏览	331
飘浮在眼前的那片白云	334
紧含眼中的泪	340
秋天里的钱钟书	350
增订版后记	359

周总理与第一次文代会

最近翻阅阿英同志遗留下来的关于第一次文代会时期的几则日记，发现其中记载了一些有关周总理的感人材料。

第一次文代会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北平召开。这是长期被迫分离的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的隆重会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莅临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使这次大会成为我国现代文艺运动史上重要的一页。

从阿英同志的日记中可以知道，在三个月的大会筹备期间，周副主席曾多次找文艺界一些同志谈话，其中有两次几乎是通宵达旦。五月十三日日记：“今晚约谈话。八时，去中南海。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周扬、沙可夫、胡愈之、萨空了、茅盾、何其芳，亦先后至。十时恩来同志来。首先谈文代会问题，次新闻纸问题，又次上海文化工作。”

第二部分谈完后，夜饭，旋继续谈至三时半。”显然，这是周副主席为了开好大会安排的一次重要的了解情况会。从参加的成员看，包括各解放区、国统区及刚从港澳、海外归来的文艺界知名人士。谈了近五小时，内容相当广泛，中心自然是文代会问题。所谓“上海文化工作”，据有些与会同志回忆说，是指周副主席关心地询问起有关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事。“新闻纸问题”，是指研究了今后出版书刊用纸如何解决的问题。另一次是在大会正式揭幕前几天。六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日记记载，文代会党组曾长时间讨论了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六月二十六日，周副主席及时听取了党组的汇报，该天日记载：“晚九时，与周扬同志等去中南海，向周副主席汇报，至晨四时许完。”这次汇报近七小时，可见汇报是何等详尽，周副主席听得何等仔细，指示又是何等具体。

从日记中得知，在会议前后，周副主席还亲自过问处理了文化界一些重大的带有政策性的事情。例如，郑振铎同志和阿英同志曾谈起，当时一些珍贵的文物无人管理，有散佚和被盗、被损坏的危险，希望能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来管理这方面的事，他们将这个建议向周副主席汇报，很快就得到了周副主席的支持。五月二十七日日记：“与振铎同志谈散佚文物事，拟成立组织整顿之。请彼计

划，再找周副主席研究。”五月三十一日日记记载郑振铎来找阿英，阿英当即“写信给周副主席”。六月三日日记：“晚饭后，得周副主席电话，云十一时来访。候周副主席至夜四时，未见来。”六月四日日记说明周副主席昨夜临时有事未来。六月七日日记：“周副主席约下午五时谈话。到中南海，与副主席洽谈了文物管理组织等等问题，至七时。与颖超同志、李琳同志同回北京饭店。晚访振铎同志。”周副主席从党的统战政策出发，对文艺界一些名人的安排，也作了重要指示。例如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从上海来北京参加会，会后是回上海还是调北京，周副主席都亲自指示。七月三十日日记：“齐燕铭同志来电话，谈梅先生问题，周副主席要其留下。”

这几则日记，虽然简略，但可看出周总理对革命文艺事业的亲切关怀，但因相隔太久，已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由此，也使我想起几十年来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经历了不少曲折复杂的斗争历程，当事的同志现在还有不少健在，如果他们能将这些往事尽可能详细地回忆记录下来，这对研究当代文艺发展史，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四人帮”颠倒黑白，把毛主席、周总理领导关怀的文艺战线诬蔑成“黑线专政”，把周总理亲自倡议成立的文联各协会打成“黑组织”。介绍这几则日记，重温周恩来总

理的教诲，也是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一个生动批判。

一九七八年二月

《西行漫画》的流传

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也是革命文艺应该描绘和讴歌的重大主题。但是，诞生于长征途中，直接反映长征斗争生活的美术作品，《长征画集》却是硕果仅存的一部。画的作者在长征途中，利用行军和作战的间隙，拿起画笔，把感触较深的景物抢画下来。当时绘画条件很差，连毛笔也难找到，所谓画笔，有时就是用麻扎起来的代用品；墨要自己做，用老百姓家锅底或烟筒里的黑灰调制；纸则随手找到了什么就用什么，往往十几张画就使用好几种不同的碎纸。这些简陋的绘画工具，放在随身的背包里，行军背着走，一有空就拿出来画，走到哪里画到哪里，一路上画了许多，随时张贴，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

这部画集能够得以保存并较快地出版，本身就